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 民俗文化视野

常 峻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常峻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2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 20 辑)

ISBN 978 - 7 - 5458 - 0010 - 4

I. 周… II. 常… III. 周作人(1885~1967)—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3636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

常峻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250 000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10 - 4/I. 10

定价 30.00 元

序一 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历程

陈勤建

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较为冷寂的时下,常峻的博士学位论文《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书稿,荣获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得以面世。这是她继她的师兄郑土有博士学位论文《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师妹尹笑飞博士学位论文《民众生活理想的视觉展演——中国民间传统吉祥图像的理论阐释》入选上海市十佳博士文库之后,又一个得到学界伯乐欣赏提携的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作为导师的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文艺学转向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在实践中提出了文艺民俗学,即文艺学和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理论构想。诚如我在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所说的:

文艺研究自身封闭体系的突破,研究视角的多方位观察,导致了民俗学研究文艺建构的激发和萌生,文艺民俗学建构的萌发和兴起,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于原来单一文艺学科的知识领域,已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借助民俗学的知识、理

论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在民俗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构建产生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并运用这种新视角、新方法来看察、研究文艺问题。

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我们学界的前辈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是训诂、考据的方式,20 世纪初出现了新的理念,主要是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论证法为先导。起因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兴起了一股新热潮,从中发现了新问题。地上的文献资料和地下的考古资料综合研究,当然这不仅仅是考古和文字学研究的新拓展,而且是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开始。

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从民间故事入手,又不仅仅停留在民间故事上。他从历史、地理民俗的角度,运用地层累积法条分缕析,发现许多神话故事传说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民俗文化语境中,由小变大,如滚雪球似的层层累积、加工而形成的。如在《孟姜女》的故事里,我们看到情节的展开:在战国时,是齐杞梁妻拒郊吊;隋唐时,变为孟姜女在池塘裸浴,被躲徭役的万喜良撞见;明清时,演变为孟姜女在后花园扑蝶,露出玉臂等。其间的变异,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民俗文化观念对形象塑造的影响,但这些并不同于西方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以某一个“标准型”为中心的扩散理论。顾颉刚从本土出发进行研究归纳,有了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认知。刘半农对此非常赞赏。顾颉刚先生的研究虽意在历史而非文学,但对文学的研究,同样具有新的开拓。何况,中国古代传统是文史不分家。

闻一多先生的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从传统的训诂、考证,到民俗学——人种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移,虽尚未成熟,但其成功之处,是以民俗事项的解读——文化学、历史学资料研究文学现象。

对尧舜禹禅让等远古神话传说和龙凤信仰研究,能一反古人的说法,而别有新意。

但所有这些研究方法,都尚未明确建构新的文化视角系统,原因是当时作为文化学科的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知识理论单薄,所拥有的文化资料大多是二手材料,缺乏田野调查,这些资料论证起来容易产生破绽,不完善,体现了这一阶段研究的不足。但作为一种方法,是一个新的开端。

文化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在文学批评中,应确立一个文化的立场、观点,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应用中国文化的立场观点、以民族文化的视角进行解读,才能突出文学中表现的差异性。比如,用日本固有民俗的文化系统解读川端康成的作品,解读村上春树的作品,往往可以读出异文化的因素来。

文化批评,既有对文化形态的选择,也有对批评方式的选择。对文化的选择不同,批评方法也不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俗的文化研究,这个文化模式应该是文艺民俗学。

国外文化批评有多种分法,美国学者魏伯司各特在《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里将其归纳为: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心理(精神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和原型(神话)批评。在西方,实际尚有结构主义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现象学批评、人类学文化批评等。在中国,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针对古今中外文艺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各种流派,归纳出十一种模式:印象式批评、诠释式批评、评点式批评、考据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本体论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实际上,西方文艺批评的其他理论与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纷纷在中国登场亮相。可见,文艺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领域里,确是流派纷呈,虽说不上无穷,但也无法用某一专家权威的几分法的见解加以圈

定。没有一种批评方法可以把文学作品解读穷尽,每一种批评只是一个角度、一个方法。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身认识的深化,还有新的文艺批评理论与方法悄然兴起,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和关注。文艺民俗学批评也正是文化批评学术思潮中卷起的浪花。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中文先生多年前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讲演中指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常与西方同行发生错位。197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文艺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的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也悄悄转向文学的文化批评理论,比如原型批评的兴起。当西方文坛文艺批评告别形式主义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时候,发人深省的是,我们国内囿于自身的原因,以探索文艺自身的特征而扬起形式主义的大旗来进行形式主义的纯文学批评,刚好与他们失之交臂,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别人走出去,我们走进来。钱中文先生认为从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来看,文艺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必然趋向。为此钱中文先生恳切地提请文艺理论的同行与晚辈,应正视并加快投入到这一世界性文艺批评和研究的潮流中去。

美国的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每个人不可能用纯粹的眼光看世界。”所以任何思维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族群的文化因素,也许以后也会受别的族群文化的影响,但“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其最基本的族群基因在一定的环境中也会显示出来的。民俗,不是一件外衣,仅披在人的身上。仅把它理解为外衣的只是一种表层的理解。民俗伴随人的生命、人的进化而形成,是人性的一部分。

就如现代化与传统是分不开的一样,许多现实人物的文化生命,就既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如上海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老家是上海郊

区,本科毕业以后到日本读博士,到英国做博士后,后来又在美國工作多年,现在回到上海工作。从他的经历看,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又是长期搞自然科学研究,习惯用科学主义的思维看待事物,人文科学,在他眼中是“空”的,没有实际作用,整个人的思维、观念、人生态度似乎都是现代的。但是,他忧虑于当代西方式的青年男女之两性关系和婚姻态度,便对才十八岁的儿子说:“今后只要你有一天把一个小孩带回家,说这是你的孙子,我就认了。”对于家庭子息的观念,却是绝对的传统。从这偶尔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位教授深层的思想:希望儿子能早日传宗接代,继承家族,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个人的思想是由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也许会受许多其他外来的文化影响,但其从小所受的族群的文化基因是根深蒂固的,也许潜伏在思维的深层,但这基础的文化观念在不经意中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无论是怎样的科学思维,都会受民俗心理影响。这种民俗心理结构对作家创作过程中的选材、立意、人物塑造、结构布局、语言的运用都有着潜在的影响,使之带上族群的影子。王朔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不乏传统的影子。他的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是传统江湖草莽英雄的形象,带有他在军队大院那个特定环境的生活痕迹。又如电视剧《亮剑》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中国民间的草莽英雄。

从创作角度来看,作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作品中的形象是否带有本民族的民俗心理基因,文学形象中也隐藏着一种民俗意象。

创作似乎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都会带有民俗心理的文化基因。《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作品写她是农历二月十二出生,这一天刚好是花神诞生;四月十六是民间送花神节,在这一天,林黛玉吟出了《葬花词》。这个情节的安排,是作家用传统的民俗事象来构造的。

从这个民俗事象来解读,在二月十二初春的花神节出生,说明林黛玉的前身是个花神;四月十六既是送花神节,又是暮春花落的季节,这个时候吟出《葬花词》,已经预示了她的命运如花一般花开花落的短暂。春天是个雨水多的季节,这时出生,泪多,预示命运的悲凉。民俗因素在人物性格中展现,使这个人物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

现当代的作家或隐或显地采用民俗事象进行创作,或是在背景的交代上,或是在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的塑造上。只要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其中的人物都会带有族群的民俗的影子。有时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统一的,有时是不统一的,但都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同一个族群的民俗基因在起作用。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虽然写美国的风情不多,但美国人的民俗思考原型——民族精神——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征服精神从中得到表现。好莱坞电影的人物大多展现了美国式的文化精神。日本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背后往往是典型的日本式的东西。

纵观历年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题材,无论手法是正统的还是荒诞的,几乎都与族群特有的民俗文化影响有关。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百年孤独》,再现了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是属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到,他的创作是受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启发,他认为,写小说其实就像“外婆讲故事”,用形象的语言陈述民俗生活。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民俗既有的各种形象之中,但这个体会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元素,其实就是乡下民间流传的“鬼故事”一类民俗。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学界百废俱兴,百家争鸣。适时,国内文艺学界,也因为解决文艺学研究的困境,提出了文艺新学科的研究。十分荣幸,我上述的想法以及文艺民俗学新学科的构想提出后,

得到了学界同仁无私的厚爱和热心的帮助。80年代中期,上下几经论证,被纳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国家“七五”文科重点研究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规划。初稿完成后,我又被组团到山东烟台,为全国文艺理论教师讲习班作试讲。后来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于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荣获全国高校第二届社科中国文学二等奖。2004年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文艺民俗学”为华东师范大学自设博士点,由此而有了新专业的博士生和他们的一批新的博士论文专著。在此,谨对曾帮助和支持文艺民俗学研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常峻博士的书稿是在对周作人文学观的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20世纪初民俗学和新文学运动中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本书是鉴于这一历史事实而展开研究的。

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新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拓荒者,将两者融合起来加以观照和研究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首次从民俗文化这一独特视野,对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及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选题具有开拓性,研究视角亦富有新意;不仅对周作人的研究有补阙发微、开拓境域的意义,亦为拓宽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该书从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视野和学术理念出发,以相当明晰的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突入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世界,对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民俗文化观及其在周作人文学思想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作出了系统阐述和深入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地确立了周作人作为文学民俗文化批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同时,本书对周氏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也有许多独具识见的阐释,其中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五四”新文学思想的本土思想来源。该书既重文献实证,又重理论思辨,并能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学术视野较为开阔;史料丰富翔实,论述全面,时

有新意,语言简约朴实,清通流畅,在资料的开掘与文本的解读上也颇见功力。

周作人的民俗学和文学的观念及实践甚为丰富多彩,这也不是本书稿所能完全穷尽的。常峻的书稿及研究也需作进一步的提高和深入。愿常峻的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是以为序。

2008年7月26日于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

序二 周作人研究的新视野

郑土有

周作人研究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以往的研究,对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文艺理论的成就及其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创建所作出的贡献,其成果不说汗牛充栋,至少也可以说是相当充分了,但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却较为少见。从这个角度说,常峻的《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拓宽了周作人研究的领域,具有突破前人的意义,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该书在充分梳理周作人研究的已有成果和大量研读其著作的基础上,认为民俗学对于周作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对人、人类、文学、历史、文化进行观照的手段。因此,本书选取民俗学视角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考察民俗学理论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建构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探讨周作人的民俗学理论、民俗文化观念与其文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及互动作用,应该说是很具创见性的。

正如书中所详细分析的,周作人之所以对民俗学感兴趣,既有时代文化思潮的社会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有着他自身的内在因素。如留学日本,使他较早就接受了西方的人类学、民俗学理论;而早

期民俗学研究的实践,则赋予了他注重民间文化的理性精神;尤其是他家乡绍兴乡野大地上的民俗生活及其经历的人和事,都一点一点地沉潜在他心里,成为他心理图式的一部分;凡此种种,使他逐渐学成掌握了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文学批评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最早倡导民俗学研究、并且认为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学者之一。他在1921年的《在希腊诸岛·译者附记》中就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有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在稍后(1922年12月)他于撰写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更明确指出: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可供专门的研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如意大利卫大略所说的,“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因此他认为,“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也就是说,他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学术理念,新文学的发展必须吸收民俗文化的养料,文学与民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新文学的要求》、《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许多文章中,在论述文学的起源、发展史等问题时,也都体现了这种理念。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初创时期,如此有意识地、积极地从民俗视角探讨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人,非周作人莫属。因此,作者认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均与他的民俗学观念有密切的关联,民俗学的学术背景是其深厚理论根基的重要部分。认真梳理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会发现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参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演变过程,并

且民俗学成为他观照、审视文学的主要视角。

该书以学术史的复杂性探索为指向,对周作人有关文学起源的民俗学阐释、文学发展史构想、文学的民俗人性观等问题层面,做了辩证分析,同时又超越一般的学科知识形态,以挖掘周作人的相关思想内核,说明作者具有相当成熟的学科发展理念和学科领悟能力。通过对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中的民俗文化视野所发掘出来的不少学术识见,对当代中国民俗学以及文艺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深切的启示意义。

常峻是文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该著作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数年磨砺加工后的成果,资料丰富,叙述条理清晰,真知灼见频现。能够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也很好说明了它的学术价值。常峻是一位年轻的民俗学者,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嘱我写序,我对周作人先生素无研究,以上只是我阅读了其书稿后的一点体会。衷心地希望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文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不懈的努力。

2008年1月31日于浦东寓所

目 录

序一 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历程·····	陈勤建 1
序二 周作人研究的新视野·····	郑土有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周作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动机、思路与方法·····	22
第二章 周作人自我文化建构的民俗选择·····	35
第一节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及文学观的变革·····	35
第二节 浙江越文化传统的濡化·····	45
第三节 世界民俗学理论的烛照·····	69
第三章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拓荒者·····	81
第一节 周作人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先锋意义·····	81
第二节 周作人的民俗学理论探索·····	87
第三节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	99

第四章 周作人的民俗文化观	128
第一节 周作人民俗文化观的生成	128
第二节 周作人中国文化研究的民俗视角	142
第三节 周作人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的确立	151
第五章 民俗学方法论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影响	163
第一节 文学起源的民俗学阐释	163
第二节 民俗学理论框架下的文学发展观	177
第三节 文学的民俗人性观	194
第四节 文学审美观的民间立场	207
第六章 周作人文学作品的民俗文化意蕴	234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民俗文化关怀	234
第二节 关于社会道德的民俗文化批判	244
第三节 鬼趣与人情——民俗信仰切入的国民性观照	252
第四节 民俗生活的丰富性与文学题材的多样化	268
余 论 眺望民间	292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0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周作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存在。他的散文创作、文学理论及思想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他带给人的是宽广的研究空间,他的人生哲学、人生道路、文艺思想、散文创作、文化思想、道德伦理观、妇女观、儿童教育观以及民俗学等,都是研究者的广阔领域。综观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本世纪初八十多年的周作人研究,可知研究者在许多领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来解读周作人,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黄开发对 1919—1997 年之间的周作人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1〕}

一般认为,周作人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1919—1949 年;1980—1989 年;1990 年至今。20 年代主要就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散文文体风格展开研究,他的文学思想、新诗创作及翻译工作都受到高度称赞。《新潮》作家傅斯年认为“人的文学”与“思想革命”的主张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同

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2〕}他的小品散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胡适、汤钟瑶、郭沫若、朱光潜、赵景深、钟敬文、冬芬等人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最初对周作人文学成就给予历史性评定的就是胡适,主要盛赞他的散文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功绩。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3〕}朱光潜在《〈雨天的书〉》里用“清、冷、简洁”来概括周作人散文风格特征。^{〔4〕}

30年代,周作人研究的深度、广度逐渐拓展,人们开始在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对周作人进行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情况、纷繁的文化观念形态,使周作人研究呈现多样化。赵京华将30年代周作人研究者大致分为左翼批评家、文艺自由论者和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追随者三派。^{〔5〕}由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文学批评方法,对周作人的毁誉自然不一样。1934年围绕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一场争论,表现了从不同视角对周作人的不同态度,也促使研究有所深化。廖沫沙写《人间何世?》、^{〔6〕}胡风写《“过去的幽灵”》^{〔7〕}批判了周作人“街头终日听谈鬼”的消极生活态度;林语堂接连写《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8〕}《周作人诗读法》^{〔9〕}予以回击并为周作人辩护;曹聚仁写《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10〕}做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周作人由“浮躁凌厉”而“思想消沉”,这种思想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11〕}